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 年 2-3 月（总第十八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2-3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一.学术成果	4
1.Fudan Journal 2010 年 3 月号出版.....	4
2.《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 2009 年 12 月总第 29 期出版.....	5
3.纳日碧力戈：民族生态与国家建设.....	6
4.王小钢、沈映涵译 孙国东校：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	6
5.顾肃：《宗教与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	7
6.邓正来译：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9
7.陈润华：余英时与杜维明思想源脉辨析——简评《中国传统的现代诠释》与《儒家思想新论》的政治哲学视角.....	9
8.林曦：英国高校小班教学模式及启示.....	9
9.拉兹、邓正来、朱振：关于道德与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法律哲学的对话（上）.....	10
10.[英国]密尔 著 顾肃 译：《论自由》.....	11
二.顾肃教授加盟复旦高研院	12
三.学术讲座	13
1.何怀宏教授主讲“哪些差异？何种共识？”.....	13
2.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三期慧园鉴赏会.....	16
3.陈定模先生主讲“中国农民城：温州人解读温州模式”.....	18
4.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四期“通业青年讲坛”.....	20
5.桑德尔教授主讲“什么是正义”.....	23
6.万俊人教授主讲“美德伦理与社群主义”.....	26
7.张维迎教授主讲“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	29
8.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	32
9.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33
四.学术来访	36
1.名古屋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来访复旦高研院.....	36
2.法国高等社科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普吉兰教授来访高研院.....	37
3.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37
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行来复旦高研院调研.....	38
五.学术出访	39

1.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 2010 年太湖文化论坛筹备工作会议.....	39
2.邓正来教授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主讲“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	39
3.邓正来教授参加上海社科院第四十四次新智库论坛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开题报告会	41
4.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参加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	41
5.林曦博士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	41
六.稿约及启事	41
1.“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41
2.复旦高研院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招生启事	44
3.Fudan-UCLA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招生启事	48
4.《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稿约.....	50
七.媒体报道	54
1.学术访谈：从“研译”哈耶克出发	54

一.学术成果

1.Fudan Journal 2010 年 3 月号出版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 Quarterly

Volume 3

Number 1

March 2010 3-29

Editor-in-Chief

Deng Zheng-lai, Fudan University

Contents

Special Topic: China Studies

1 An Overview: The Sudden Chang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Choices

Lu Qian-jin

32 Political Refo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Xiao Jia-ling

Articles

90 Going Behind the Scenes: The Input Hypothesis Revisited

Shen Li

113 Gradualism and Optim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John Dewey and Hu Shi

Zhang Shuang-li

Speech

132 Individual Right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Joseph Raz

Book Reviews

149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by S. Philip Hsu

153 Yu Jian-xing, Jiang Hua, and Zhou Jun: Chinese Civil Society Grouping in Participation: A Research on Wenzhou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He Zeng-ke

156 Zhang Wei-wei: China Touches the World

by Ren Xiao

164 Charlotte Ikels: Filial Piet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by Pan Tian-shu

168 New Books

Within the Academe

170 Develop through Media Convergence and Innovate through Good Tradition – The Summary of the World-renowned School of Journalism Deans Forum

174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Geograph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79 Contributors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

第 3 卷第 1 期

总第 9 期

2010 年 3 月号

主编

邓正来, 复旦大学

目 录



中国学研究专题

1 中国经济概览、突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陆前进

32 中国政治改革与可持续发展/Brantly Womack

55 中非关系：进展、挑战与前景/肖佳灵

非专题文章

90 深入幕后：重析“输入假设”/沈黎

113 渐进主义与乐观主义——约翰·德威与胡适的比较研究/张双利

讲演

132 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约瑟夫·拉兹

书评

149 面对脆弱伙伴下的寻求合作与预防冲突——评 Susan L. Shirk 《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徐斯勤

153 在参与中成长：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一种新分析框架——评郁建兴等著《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何增科

156 思索中国发展经验——评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任晓

164 孝道与孝行：一个来自田野研究的跨学科视角——评 Charlotte Ikels 编《孝道：当代东亚的实践与对话》/潘天舒

168 书讯

学术简讯

170 在融合中提升，在传承中创新——“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综述

174 清代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79 作者简介

2.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 2009 年 12 月总第 29 期出版

邓正来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第 1 版

目 录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邓正来

主题研讨

王礼鑫 公共空间、集体行动与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业委会及业主维权的“自主性国家-结构-能动”分析

张曙光（主笔） 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与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
任剑涛 市场马列主义的“中国奇迹”与米塞斯断言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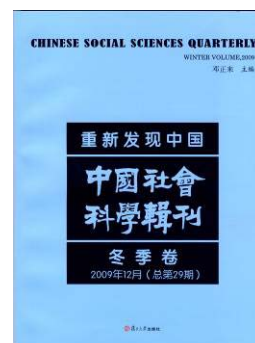
本刊特稿

公丕祥 中国司法革命 60 年

学术专论

刘 擎 文化自主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韦 森 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



陈周旺 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
赵全胜 全球化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学术综述

熊万胜 关于小农组织化道路选择的百年纷争
汤善鹏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外专论

乌尔里希·贝克，王小钢等译 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
阿伦特，陶东风译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约瑟夫·S·奈，邓正来译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书评思考

陈润华 余英时与杜维明思想源脉辨析——简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与《儒家思想新论》的政治哲学视角
唐代兴 探索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世界性和实验性道路——评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和《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
张江 夏 戡 后集体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整合议题——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

学者诗思

汪天德 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王宁 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3.纳日碧力戈：民族生态与国家建设

《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4-5页。

提要：在全球化中民族主义有增无减，各种“建国对策”频繁出现，如“民族更名”、“去政治化”、“民族共治”等等。但从历史看，中国现代民族政策是历史上利益集团之间政治博弈的真实结果，是地缘政治与本土文化结合的经验体现，并非空穴来风，想象构建。中国民族已经形成多元文化的现实，多元文化也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已经成为“耐心的历史”。“民族”是中国“土产”，本无译。根据本土的人类学视野和多族共生的现实，都指向以国统族的必然性，也昭示了心物我三元合一的中国智慧。

4.王小钢、沈映涵译 孙国东校：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冬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32-139页
摘录：世界风险社会是一个潜在的变革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常规状态和紧急状态交织在一起。人们可以从这一为常规社会理论和风险社会学所忽视的方面揭

示出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在处理灾难性风险时，人们正在就未来紧急状态的当下立场进行谈判。对紧急事件的预期状态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世界主义的。相信经由政治行动（为受到威胁的人类利益而采取的政治行动）能够转移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这一信仰，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达成共识和合法化（legitimation）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各种基本原则，包括自由市场原则和民族国家秩序原则，都开始受制于变化、各种替代可能性的存在和偶然性。

5. 顾肃：《宗教与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

内容提要：本书论述了宗教与政治从古至今复杂的互动关系，主要讨论宗教与意识形态、宗教与政权、宗教与政治势力、宗教与文明及国际关系这四大方面的热点问题。纵观世界各大宗教曾经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历程，政治神学起过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的变化，宗教改革或世俗化要求摆脱国教，实行政教分离。作者讨论了宗教与政权关系的不同模式和历史发展，以及宗教与自由民主法治、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既共同信奉某些宗教，又从不同的方面利用宗教，一方侧重于维护现有统治秩序，一方则为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服务。自近代以来，宗教与政党的互动关系也一直在变化过程中。宗教对于推动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某些局部冲突也曾经带来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灾难，宗教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有不同模式。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者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事反人类的罪恶行径。因此，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宽容和对话是解决宗教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



目 录

导论

- 政教统一与政教分离
- 宗教对政治的影响

第一章 宗教与意识形态

- 第一节 宗教与统治意识形态
 - 从意识形态的特征看宗教
 - 历史上的统治意识形态
- 第二节 欧洲中世纪政治神学
 - 早期基督教与政权关系
 - 中世纪的政治神学
- 第三节 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
 - 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
 - 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
 - 宗教改革与自由思想和民族主义
- 第四节 东方宗教与官方意识形态
 -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日本的国教

第二章 宗教与政权

第一节 政教关系模式

政权与教权

政教合一的不同方式

第二节 政治与宗教分离

政治现代化的产物

政教分离的宪法规定

关于不得确立国教的司法案件

日本摆脱政教合一的独特方式

第三节 宗教与法治

信仰自由与宪政

关于信仰自由的司法裁决

基督教与公民权利意识

第四节 宗教与社会主义

前苏联的宗教与政治发展

战后东欧国家的宗教与政治

近代以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当代的“解放神学”

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协调问题

第三章 宗教与政治势力

第一节 宗教与统治者

道教

佛教

统治者对于儒道释三教的态度

第二节 宗教与被统治者

农民起义中的宗教

太平天国与外来宗教

第三节 宗教与民主政治

基督教教义与民主革命

现代基督教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第四节 宗教与政党

历史上的政治派别与宗教

当代世界的政党与宗教

第四章 宗教、文明与国际关系

第一节 宗教与文明的发展

医疗保健事业

教育事业

第二节 宗教与国家民族认同

- 强宗教认同下的民族主义
- 弱宗教认同下的民族主义
- 拒绝宗教认同的民族主义
- 第三节 “文明和宗教的冲突”
 - 宗教冲突与和解
 - 关于文明冲突论
- 第四节 宗教宽容、对话与和谐世界
 - 宗教宽容和同情的理解
 - 对话的必要性
 - 宗教对话的基础
 - 关于对话的基本规则
 - 对话的基础和当今进展

参考文献

6.邓正来译：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冬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155-161 页
摘录：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国际关系学不是一门实验室性质的科学，历史学与其最为接近，但当然不受控制。因此，即便日常政治中没有变化趋势，基金会资助没有倾向，或者学术刊物主编在论题偏好上的习惯思维也没有改变，理论也是注定要变化和发展的。于是，沃尔兹一书所用的书名“国际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狂妄，因为他实际上只是对现在已成过去的两极时代做了一种偏重结构的分析而已。今天，所有试图根据结构极化对后冷战时代进行描述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军事单极性、国家间经济关系上的多极性以及跨国层面上权力分配的无序性。

7.陈润华：余英时与杜维明思想源脉辨析——简评《中国传统的现代诠释》与《儒家思想新论》的政治哲学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冬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162-167 页
摘录：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史和政治智慧中，天人关系与政治秩序（王制）的类型及完善密切相关，它涉及政治秩序哲学-神学的所有主题，涉及人类生存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关怀，以及解决当下世代与世世代代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方案。能否正确理解中国天人关系之与希腊-基督教之古今神人关系的差别，可谓是辨析政治秩序类型的关键。

8.林曦：英国高校小班教学模式及启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 12 月第 108-112 页
摘要：各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中，英国的高校小班教学模式颇引人注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的高校小班教学模式已经逐步标准化和制度化，分析这种教学模式背后的教育理念和所期望达致的教育目标，及其相关的评估制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

9.拉兹、邓正来、朱振：关于道德与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法律哲学的对话（上）

《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79-87页

拉兹（Joseph Raz）：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特聘院教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

朱振：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

编者按：2009年9月17-20日，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始学术委员约瑟夫·拉兹应邀访问复旦高研院，并在“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讲）做了题为“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的演讲。拉兹教授是继H.L.A.哈特教授之后最伟大的法律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当代自由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在拉兹教授访问复旦高研院之前，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朱振讲师拟定了一个学术对话的问题单，先行寄给了拉兹教授。拉兹教授以书面形式回答了这些问题。后在拉兹教授访问复旦高研院期间，邓正来教授和朱振讲师与拉兹教授就相关理论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对话和讨论，遂形成现在的对话文本。

一、

[邓正来等]拉兹教授，您好。我们想在您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访问之前，就一些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相关的法律哲学问题与您进行讨论，以期在您访问高研院的时候能够就一些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在您此前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您曾经对自己的学术转向问题做过这样一个概括：您在70年代的研究重点是法律哲学，80年代是政治哲学，90年代则是理论伦理学。当然，这个说法也是从研究重点而言的，因为您在1975年就已经出版了《实践理性与规范》（*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而这是一本迄今为止在道德哲学领域引证率比较高的著作。在您于2009年出版的新书《权威与阐释之间》（*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到，您从法律、政治和道德的维度对实践哲学的一些核心问题阐发了诸多看法。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这本著作基本上概述了您对实践理性哲学语境中的法理学和法律性质所做的研究工作。此外，透过您的研究理路，我们也了解到，您对学术研究的分科化与专业化一直持抵制的态度，而这也比较充分地表现为您的研究领域和论题的不断转换。

对此，我们的问题是：第一，在您对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所做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中间是否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您始终关注的，或者说是否您对哪个或哪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导致了这种转换？第二，我们对您学术兴趣的变化相当感兴趣，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从法理学到政治哲学再到理论伦理学之间转变的原因？

[拉兹]我并不太倾向于把我工作方向的各种变化看成是兴趣转移，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同一种兴趣所具有的不同阶段的完成。这一兴趣便是我对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规范性之性质（the nature of normativity）的好奇心，它贯穿于我曾经做过的所有研究。如果我们试图阐明规范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心智哲学和行动哲学，也就是对我们所具有的合理性、行动的各种理由以及理由的各种类型（包

括法律理由、政治理由和道德理由)进行探究。我愿意认为,我从未放弃我过去的任何兴趣。我一直把试图解释规范性这个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持续地检视各种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其他各个方面,并希望我的工作在多年的努力以后能够在深度和可理解性方面有所增进。

当下的许多哲学家似乎都认为,对规范性的解释涉及一个大问题:规范性如何能够与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相一致?我的观点与他们不同,因为我认为,就规范性而言,有着许多难解之题,而不是只有一个大问题。而且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探究其中各种不同的难题。因此我认为,我的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你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松散的统一性:我所出版的大多数论著都致力于处理各种不同的有关规范性之性质的问题。但是,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统一性,因为我并不认为关于规范性的所有问题真的就是一个大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比如说,即使我所撰写的法律哲学论著涵盖了许多论题,这些论题的核心仍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而这实际上正是法律规范性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称谓。最近,我的这一探究扩展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受制于各种理由这一事实是如何表现为责任原则或责任学说的。

对于我的兴趣,我应当提到一个限度:对于那种以应用伦理学著称的问题来说,我并不认为哲学独自就能够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或者也无法独自给任何领域提供真正详尽的政策建议。比如说,我不认为哲学仅靠一己之力便能够为起草一部好的宪法提供一种方案。有关制定一部宪法的各种决定,都要取决于地方性条件、地方性传统、文化背景以及既有的法律状况。各种改革的思想也都应当受到所有上述地方性状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好的东西,对于另一个国家来说就可能不是好的。

当然,在当下的世界中,也存在着增加超越国界之一致性的强大压力。基于各种理由,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欢迎的,尽管我在这里无法详述这些理由。但是,人们很容易夸大或误解这些理由的力量,而且也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存在着一种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解决方案。哲学家尤其容易犯这种错误。他们容易夸大哲学所能独自贡献的东西,并因此而偏爱普世的解决方案。由于我试图避免这一谬误,所以我在论涉具体政策问题的时候颇为谨慎。

10. [英国]密尔 著 顾肃 译:《论自由》

作者: [英国]密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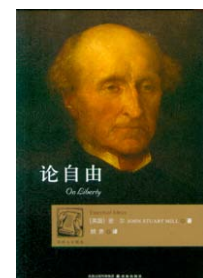
译者: 顾肃

ISBN: 978-7-5447-1097-8

版次: 2010年2月第1版

译者序选录

密尔还把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理论直接推广到经济生活,尤其是推广到与自由竞争有关的活动中去。他认为,一个人在合法的竞争中获胜,也许会使失败的手感到痛苦和负担,但对于这些失望的竞争者,社会并不承认他们在法律或道德方面享有免除这类痛苦的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干涉。贸易本来是个社会行为,由于货物总向公众出售,因而直接涉及到他人利益,有人便因此而主张政府限定商品价格和规定制造程序。但密尔强调,实现价廉物美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完全自由,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来制约生产者和销售者。在密尔看来,对贸易的限制和对生产的限制



都是约束，而约束就是罪恶。他又认为，一些经济约束均未产生发展原来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此，密尔对具体经济立法的界限并未阐述清楚，而是依靠习惯来判断。比如他认为，禁止出售毒药，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是干涉了购买者的自由（这里显然主张对经济活动毫无约束），但对儿童实行强迫教育却不是侵犯自由，而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和福利，密尔又打算接受一项庞大而不明确的工商业规章制度。

译者在翻译这个文本的过程中参考了程崇华的中译本。为保持英文版的原貌，这个文本一概遵照英文版的原段落划分（故段落的平均篇幅较长）；同时也在不影响原意表达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原标点符号。文中人称代词泛指时用“他”，这在密尔那个时代是正常的，当然到今天已经不合潮流，为尊重历史，译者未予改变。正文中用 符号标记的脚注系密尔自己所作，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脚注为译者所加（参考了本书英文版本的编注）。翻译这样一部一百五十多年前写成的名著，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译者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二. 顾肃教授加盟复旦高研院

2010年3月1日，顾肃教授以专职研究人员身份正式加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顾肃，男，1955年4月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教授。1981年获得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主攻西方哲学。随即留校任教。1983年至1986年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留学，主攻西方哲学包括法律哲学，其间于1985年获得该校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博士论文写作，于1989年获得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南大任讲师。1990年12月晋升副教授，1995年3月提升哲学与法学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



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文学者，主要从事法学和法哲学等方面的进修、研究与讲学交流。此后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等校讲学交流，主要内容为政治与法律哲学、西方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等。

学术职位：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招收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1)西方政治哲学；(2)当代西方法哲学；(3)西方应用伦理学与管理哲学。

讲授课程：

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西方应用伦理学》等课程。

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研讨》、《西方科学主义哲学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等学位课程，并为全校开设研究生公选课《人文素养与管理艺术》。

为本科生开设的必修课程：欧洲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南京大学公共选修课《西方哲学史》等。

获奖成果:

专著《科学理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1997 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文《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 1999.3》）1999 年获得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专著《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获得 2001 年江苏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科学划界标准及其解决》获得《江苏社会科学优秀论文精选（1990-2001 年）》二等奖（评奖时间：2002 年 8 月）。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影
响》，1.5 万元，时间 1994-97 年，已经结项。

2.主持南京大学科研项目《当代西方公共哲学研究》一项，0.5 万元，时间 1999-2000 年。

3.主持《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研究》，1.0 万元，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2001-2003，已结项。

4.主持《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研究》，35 万元，南京大学创建高水平大学 985 工程项目，1999-2002。

5.主持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改革项目《现代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研讨》，1.0 万元，2001-2003。

6.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公共哲学主导思潮研究》，6.5 万元，2004-2007。

三.学术讲座

1.何怀宏教授主讲“哪些差异？何种共识？”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五）

2010 年 3 月 7 日晚 6: 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五期由何怀宏教授主讲，题目是“哪些差异？何种共识？”。何怀宏教授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研院兼职教授。他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文历史、人生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学术论著主要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等等。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纳日碧力戈、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沈国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葛四友等参加了此次讲坛。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为大家介绍了何怀宏教授的学术研究经历，并代表高研院为何怀宏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兼职教授聘书。



接着，何怀宏教授做了题为“哪些差异？何种共识？”的演讲，他从麦金太尔(Macintyre)的《谁的正义？那种合理性？》谈起，主要讲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何教授描述了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与多元化共存、差异与平等并倡。诚如孔汉思所说，我们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但却没有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越来越强的趋同倾向，都要求平等和公平；然而，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信仰问题上彼此依然不同，并且体现出越来越强的认同要求，这事实上是承认差异的多元化。冷战之后，全人类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与文明的此起彼伏式的发展样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差异依然存在，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差异可能带来的危险呢？

第二，针对当下论者比较关注的文化差异，何教授重点剖析了两种差异：其一是“高端的差异”，指宗教的或信仰的安身立命之处的差异，涉及最高的和根本的追求；其二是“底部的差异”，指民族或种族在生理体质、性格气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个人与生俱来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积淀和决定了的差异。特别就族群和种族(ethnically and racially)方面的差异而言，何教授回顾了梁启超所写的《新民说》和潘光旦译述的《优生原理》中的相关内容，指出：如果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甚至可能是根深蒂固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不会消失，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或许将要更加迫切地去寻求一种恰当地对待这些差异的共识。

第三，除了一些临时性的、权宜性的妥协和协议，何教授认为人们希望寻求一种更具有根本性的持久共识（即其本身就具有一种目的意义的共识），进而能够保障合理的文化差异，保证和平的列国共存。这种共识是具有道德性质、涉及政治方面的共识，而这种道德性质的政治共识的一个很好说明即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撇开这种国际正义共识的可能性不论，何教授立足于伯林和亨廷顿这两个相当强调差异和冲突的思想家的观点，指出：如果在最难达成共识的知识分子中间也能初步形成一些道德共见，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范围远比这更广大的人们中完全有可能达成类似的共识。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的点评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刘教授赞同何教授的基本价值观念，并指出其三个部分分别运用了描述性、解释性和规范性这三种讨论方式，结构清晰、论证严谨。其次，从学理上，刘教授提出了一些质疑，即“底部的差异”并不一定能够导致血与火、甚至同归于尽的冲突。譬如说生活中男女两性的差异和民族国家的差异也可能导致融合、包容乃至共生，所以学者们对于差异导致冲突这个判断涉及到的种种原因和条件，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再次，刘教授强调了“尊重每个人的应得的正当的权益”这一底线伦理，而大量的人际和国际冲突事件的出现证明了一部分人习惯于一方面承认“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原



则,另一方面把宗教信仰、文化信念等原则放在最高地位,而不是将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一原则放在第一位。刘教授对儒家“满街都是圣人”的宣教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培育提高之间的必然关系提出疑问,同时也对欧美国家色情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促进和道德水平的滑坡之间的必然关系表示怀疑。此外,刘教授讲述了许多生动活泼的例子证明现实生活中尊重差异的重要性。最后,刘教授对“一个道德原则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这个问题做了阐述,指明:既然人们具有不接受某物的能力,那么心中的道德原则就很难说是客观的。而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可普遍化原则,这个背后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还有待进一步梳理。



评论嘉宾刘建军教授主要从政治学角度进行了点评:第一,政治学理论是很难达成共识,也即很难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和信念。第二,基于底线伦理而形成的正义处处遭受权力的限制,在暴利监控的条件,寻找所谓的政治共识很难触动现实政治的规划和结构。第三,刘教授阐述了自己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解,并对何

教授提出的在范围上是政治的共识提出质疑。他引入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提出的三种正义原则(即团结的社群是与按需分配的正义观相联系的,工具性的联合是与应得相联的,公民身份的联合体是与平等分配的正义观相联的)指出:在这种多元正义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底是美德和公益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这些复杂的问题似乎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但却好像还留下不甚妥帖的遗憾。总的来说,他认为:既然在政治领域中的共识难以达成,那么政治学的价值就在于对暴力、暴政和强权的反思与批判;在此基础上,现实的政治才可能走一条混合的和折衷主义的道路。

主讲嘉宾何怀宏教授感谢了两位点评人的评论,并做了简单回应:其一,传统的伦理学是一种目的先导的伦理学,手段的不安到了现代社会成了更要优先考虑的东西,不再适用目的证明手段这一简单的逻辑;其二,就可普遍化问题而言,物理事实的客观性在于它与人类没有关系,而涉及到道德规范的客观性,恰恰体现在:



它和单个的个体无关,也即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其三,政治学研究和实际政治操作过程是有距离的,中国政治的“术”的实践较多,而政治的“学”的研究太少。其四,涉及到温柔暴力,人们很难达成共识,但在赤裸裸的物理暴力上,人们达成共识是相对容易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提到的:“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在场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有:(1)差异是一个状态,还是过程?共识和差异的关系是怎样的,共识是先于差异产生的,还是后于差异产生的?(2)如何能够使建立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之上的共同体之间

的共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3）正义有没有代际差异，它会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流变，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正义的共识？（4）何老师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只有在“世界国家”的结构层面上，正义观才有意义。那么，如果不具有这样一个结构层面的情况下，正义又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5）共识是不是具有强制性（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成就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具备这种强制性，它是不是不道德的？（6）根据何老师的观点，正义的维系最后都会诉诸于有实效的法律，法律必然会出场；可是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法律不会出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何怀宏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解答。他指出：（1）他所讲的“差异”应该是呈现为一种状态和事实的“差异”，而共识不是由差异而产生的一种对策，差异是很难消除的。（2）我的演讲还没有涉及到操作层面的问题，它只是在哲学层面来讨论，诉诸人们心中的直觉和共识，旨在唤起人们的良知；（3）在美国立宪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妥协，实现利益制衡，这种制衡是一种有远见的平衡，即考虑到代际正义，关心后代的利益；（4）我们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达不到法律和正义完全一致的理想正义。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有一种正义存在，人类不会掉到黑暗之中；（5）道德的共识是不伤害别人，它是法律背后的东西，它包含着一种良知和直觉在里面；至于多数裁决的方式，在民主中，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这是一个曲折的之字形过程，在总体上是公平的。（6）生活中的行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不能理想化的归结为两个极端：合法或者非法。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第一，关于民主中的反复博弈问题，他指出：这种逻辑忽视了跟生命有关的时间性和决策本身的危害性问题。生命的代价谁来承担？这不是通过一个“公平性”就能够解决的？第二，关于现实冲突中的底线伦理问题，他认为：现实中，冲突到处存在。既然每一种宗教和文明都有这个底线伦理，可是为什么它在实践中从未被置于优先地位？

此次讲坛是高研院本学期第一次讲座。尽管室外寒冷如冬，但整场讲座仍是座无虚席。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2.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三期慧园鉴赏会

2010年3月12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办了第三期慧园鉴赏会。鉴赏会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

本次鉴赏会的主题为艺术，内容为建筑大师鉴赏，具体选取了“我的建筑师”(My Architect: A Son's Journey)这部影片为鉴赏对象。该片是导演纳撒尼尔·康(Nathaniel





Kahn) 拍摄的一部关于他的父亲生平的纪录片。他的父亲路易斯·康是美国费城的著名建筑师，生前设计了许多著名建筑，包括沙克学院、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国会大厦等。1974 年他因心脏病发作而去逝，是位公认的上个世纪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路易斯有着三个不同家庭的生活，他和妻子及和妻子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同时他还有两个恋人，每个恋人有一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纳撒尼尔·康。当父亲去逝时，纳撒尼尔只有 11 岁。

为了对故去的父亲有更多的了解，解开关于父亲的种种谜团，纳撒尼尔踏上了一个特殊的旅程，参观父亲设计的建筑，探访与父亲生前工作、相处过的人们。通过父亲的建筑和人们的讲述提供的种种线索，纳撒尼尔最终对父亲的事业、爱情和家庭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影片结束后，观众们从建筑美感、建筑师生存环境、中外建筑比较、人生哲学思考、精神分析等角度发表了各自见解与评价，并提出了很多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西方建筑美在哪里？为什么中国没有出建筑大师？何为永恒？等等。现场观众还对路易斯·康的人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发人深思。



主持人邓正来教授认为本片讲述的不是建筑，不是中外建筑的优劣，而是讲述了路易斯·康这个真正的流浪者不断追寻自己的家园和归宿的人生。最后他指出，通过这个影片，大家应该叩问自己的心灵，思考自己的人生。邓教授感谢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来参加此次慧园鉴赏会，并欢迎大家下次前来，踊跃发表各自的观点与看法。



此外，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苏海龙博士和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沈映涵、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等参加了本次慧园鉴赏会。

附慧园鉴赏会简介：

人生天地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依然环绕并贯穿我们的生活。人之为人，秉承天地之无限厚爱，唯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者，所谓独学无友者，所谓格物致知、观风理俗者，皆是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无穷的远方，把胸怀装下古往今来；对祖先、我们和子孙，对天空、大地和人世，一样的尊重，一样的保持体贴、热爱。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王家的礼乐教育，印度佛家僧团的讲座修行，希腊雅典学院的演议辩论；去古未远，尚有村社私塾-书院-太学体系及道观、寺庙等研习智慧之所在，如今则是大学体系。

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慧园鉴赏会意在以纪录片、电影、音乐、戏剧等为引子，对所有爱智者开放的论辩和批评，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风俗和意义，学会锻造我们的著作、生命和敬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慧园鉴赏会未来每月将进行一次，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舒彩霞)

3.陈定模先生主讲“中国农民城：温州人解读温州模式”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五）

2010年3月16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五期在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由陈定模先生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中国农民城:温州人解读温州模式”。陈定模先生是原苍南县龙港镇委书记、苍南县委体改委主任,被评为“温州市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浙江省建国60周年6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全国第四届百人奖农村十大杰出人物”、“全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农村人物”等荣誉称号,代表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民间智慧”。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张乐天 and 周怡,以及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沈映涵、孙国东、林曦、陈润华、纳日碧力戈等。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他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简要介绍了座谈嘉宾陈定模先生的经历。

接着,陈定模先生作了三十五分钟的发言,主要讲了为什么要建龙港农民城以及它是如何建起来的。

首先,陈定模先生介绍了龙港的概况,包括人口、面积、GDP、财政收入、道路建设、码头、中小学校、医院等等,通过今昔对比凸显龙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



其次,陈定模先生针对龙港发展之初面临的“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介绍了他当时所采取的举措,即“户籍改革”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通过“级差地租”募集资金,大兴民营企业,进而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在发展过程中针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声音,陈定模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说为挡箭牌,既赢得政治意识形态的宽容,也为龙港的发展争取了相对宽阔的实践空间。

再次,陈定模先生有感于温家宝总理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论述,就如何提高农民工作积极性的问题,指出农村发展关键还在于问计于农民,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先进经验。回忆当年,他说自己正是借助农民的智慧、遵循农民的意愿,积极主张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处理好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协调的矛盾之后,才为农耕赢得了宝贵时间,更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并最终为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陈定模先生指出要通过城市化造福农民。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带来诸如“同命不同价”、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劳动产品附加值低等不公平境遇。脚踏实地、灵活操作，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通过合理的城市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当务之急，它既可以扩大内需，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如果仅仅鼓励“离土不离乡”和“返乡创业”，而不是推行合理的城市化，那么现有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和严重，例如留守儿童、农民工、空心村等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挑战，耕地面积可能进一步减少等等。



在第一轮学术讨论中，在座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农民的优点有哪些？为何政策的改变就能够带来如此之大的改变？反过来说，中国农民的缺点有哪些？你所设想的农村改革方向是怎样的？除去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外，龙港成功的必然性如何？华西村和龙港村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优点和缺点有哪些？“制度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当年龙港村发展迅速，那么在当今这一优势已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年的经验从哪些方面还是可以借鉴的？陈家堡村如何与邻村形成和谐的共生局面？龙港发展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除了经济水平之外，城市化给农民带来的问题和好处有哪些？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打造成功，是什么原因？户口事实上附加了很多因素，名义上的取消意义不大，你对户籍改革怎么看？等等。



陈定模先生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指出：（1）抓住机遇很重要。三年之后都改革开放了，所以就很少的人再去龙港了。人力资源同样很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2）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各有千秋，现在温州民间资本雄厚，实现



了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没钱做的事”的转变。（3）通过修祠堂等办法，既延续了传统文化，也凝聚了民心民力。（4）基于农村可能出现的党员家族化、富人村官化、村官自治化等现象，推行基层民主乃是当务之急。（5）户籍改革的巨大阻力来自于已经不是农民的既得利益者对还是农民的那部分群体的不退让，前者担心后者影响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接着，陈定模先生又作了二十分钟的发言，讲述了他在工作和退休之后了解并化解农村各种复杂矛盾的经验。其一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化解农村宗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冲突的后果，以一个中立的长者的身份主持公道；其三是运用各种文化和传统处理相关的冲突，比如运用《圣经》等宗教教义处理与宗教有关的冲突等等。

在第二轮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主要谈了自己的评论和感悟，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龙港是讲了一半的成功故事，接下来仍面临着很多棘手问题，诸如劳资矛盾、经济结构的转型等；城市化在哪些方面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面对不愿意城市化的农民，如何采取合理措施？如何看待农村



土地私有化的后果和建设城市“平民窟”的主张？龙港如何处理农村的阶层分化？温州地区的农村发展政府已经并将继续如何起作用？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陈定模先生和到场的诸位嘉宾，并作了简短的评论。他主要强调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解释中国模式的过程中，不可忽视民间的“生存性智慧”所起到的作用。陈定模先生的农民城市建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二，与此相关，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大都忽视了“意识形态”这个维度。相对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的改革进程其实是一个“未意图的后果”，它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其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促进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恰恰是各方面适当而灵活地借助了意识形态的保护和指导作用而造就的。

（上述大部分照片由摄影师胡书平提供）

4.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四期“通业青年讲坛”

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四期学术讨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MPA中心副主任顾丽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张小勇，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王川兰邀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担任本次通业青年讲坛的主持人。高研院研究人员吴冠军、陈润华、纳日碧力戈、沈映涵、刘清平、孙国东、林曦等参加了本次讲坛。许多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和老师纷纷来到讲坛现场参加讨论。



首先，邓正来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讲演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三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讲演嘉宾聘书。



主讲嘉宾顾丽梅做了题为“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创新之思考”的学术报告，一共有五个要点：

第一，描述了网络参与兴起的现状。嘉宾从上海钓鱼执法、两会E提案、网民人数的增加、三晋大地躲避地震等事件讲起，描述了我国网络参与正在逐步兴起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现状。

第二，梳理了网络参与对政府治理创新的双重影响。公民的网络参与一方面可以分担政府的责任、减轻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积极要求。政府应当通过对网络资源的整合，既对不同的声音做出承诺，也可以将公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从而建立起责任共担的社会机制。

第三,对网络参与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反思,特别针对网络话语主导权问题和“网络暴政”问题谈了看法。针对网络话语主导权,她指出:由于网络话语的暴力作用,公民渐渐丧失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能力,最终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网络参与使民主行政成为可能,对新时期的地方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表现为治理理念的创新,也即如何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治理理念,政府的角色也随之从管理者、控制者变为协调者、表演者。

第四,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公众参与的进程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公众参与与政党政治发展与执政的问题?如何协调好公民政治参与与保持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等等。

此外,关于如何提升网络参与度,顾丽梅博士从教育、先进技术、民主行政和政府体制创新、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主讲嘉宾张小勇博士做了题为“维柯的政治哲学”的学术报告,他结合自己以前从事的关于维柯的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博士后研究,扼要地谈了以下三点:



第一,为什么要研究维柯?嘉宾主要从古今之争、文艺复兴的意义、普遍性和历史性的关联、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等角度解释了维柯思想的重要性。他强调:对维柯政治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开拓出一条新的不同于政治科学和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进而也能更好地发掘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

第二,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维柯的政治哲学?这涉及到政治的含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区别,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文艺复兴运动等等。他以维柯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和《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科学原则》中的论述为起点,将其中讨论政治的起源、概念、本性、体制、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学术资源发掘出来,把维柯的政治哲学主要内容概括如下:以人性的现实原则为基础,以人性的教育为目标,以人性的历史为原则,与静止、僵化、抽象的人性观相区别,以感性具体为特征,区别于现代政治哲学所谓理性普遍的特征。就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关于权威、历史以及人的政治能力和实践的哲学,这区别于以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哲学;它试图从历史和起源寻找永恒的政治原则,这又区别于把时代潮流断定为永恒普遍的政治原则的研究。

针对日益强势的科学主义,他强调,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至少有如下要求:纯粹简单的定义和假设的逻辑基础,从基本定义出发的数学化、模型化和逻辑化,用思维为现象立法等等。用这种科学主义的思路来研究政治,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西塞罗的《政治篇》更多的是理念的思考,吴兢的《贞观政要》更多的是现实经验的总结等等。这种研究方式将历史、时间乃至人物抽离出了政治现实,剩下的是概念和概念本身的叠加,丢弃了人和政治的感性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政治和哲学的视野。

第三,维柯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针清醒剂。它提示人们:要恰当地理解所谓提高人性、观察人的政治能力、着眼人的政治实践、尊重民族的独立创造精神、把握政治的历史特性和历史阶段、塑造健全的公民和政治体制;在变革当中恰当把握传统与历史的永恒特性,而不至于沦丧到一种精神和社会的野蛮反思状态,也即表面上日益驳杂的反思制度却隐藏着日益贫乏的人文精神。



此外，他还谈到了自己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的一些理论思考。

主讲嘉宾王川兰做了题为“重新定义与理解非政府组织：一个发展的视角”的学术报告：

首先，她用定义和举例的方法介绍了目前学界对非政府组织（也称第三部分、非盈利组织）的几种定义，主要涉及法律、收入来源、社会功能、公民社会等角度。此外，她还补充了王绍光教授提出的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特征。

其次，她对上述理解进行反思，追问这些理解是否是全面充足的？是否恰当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发展？特别针对非政府组织资金不足的情况，提出是否可以发掘其自身的生产发展能力。

再次，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性提高上有何工作可做？她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公民的社会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公众参与机制逐步发展和健全起来，老百姓自古就有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愿结社的公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旨在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提供医疗保健、资助艺术事业以及为穷人营造安全保障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相比较，它还具有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通过在社会和家庭中产生更大的福利，对弱势群体在能力和资产上面的开发，它对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在嘉宾讲演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听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主要有：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如何看待理念和现实的关系？网络的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为何？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是否具有一致性？维柯政治哲学相对的中国的正当性是否超脱出它本身的正当性？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所谓网络暴政的说法是否不够严密？绝对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会导致专制，那么什么样条件下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是可以接受的？能否给发展角度给一个更加精确和详细的表述？维柯在中西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古今转换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NGO 的盈利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讲演嘉宾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大家的讨论非常激烈。



接着，顾肃教授对本期讲坛做了学术点评：其一，网络参与涉及到言论自由这个宪法权利问题，其中关键要确定言论自由的界限，这关系到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简而言之，人们对于其言论造成“直接的当前威胁”一定需要负责，依据这一判断可以大致确定出言论自由的界限。而对于未来的抽象的判断，考虑到少数人掌握真理的情况，应当鼓励积极的言说。其二，在语词上，不妨用网络谣言及其负面效应来代替网络暴政，这可能是较为缓和的说法。其三，网络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基于对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及区分谣言和真言的能力，不必对谣言的负面效应过于担心。其四，对维柯思想的研究涉及政治哲学定位以及对西方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评价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其五，绝对的个人主义导致专制，这是

不严密的说法。需要对前提及界限进行澄清。其六，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发掘出非政府组织的活力，使之成为多元时代联系政府和社会的绝佳的桥梁。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涉及到宗教信仰、个人名誉权等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
所有同道/特别是三位讲演嘉宾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希望
以后的讨论能够更加激烈一些。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进行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5.桑德尔教授主讲“什么是正义”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六）

2010年3月19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六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由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主讲，题目是“什么是正义（What is Justice？）”。桑德尔教授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学术论著包括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Justice: A Reader*,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等等。本次讲座由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顾肃、林曦、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讲坛。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简要地介绍了桑德尔教授。接着，现场播放了桑德尔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讲座视频，过后，桑德尔教授正式登上演讲台为复旦的同学们作了一场期盼已久的演讲。桑德尔教授首先感谢同学们的到来，期待今晚能够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与同学们相互学习。由于同学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对正义问题会有非常丰富的见解。

桑德尔教授描述了理解正义的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认为，正义意味着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快乐，也就是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式的功利主义所持的观点。第二种进路认为，正义不单单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宁是一个关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安全的问
题。这即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0-2002）式的



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正义不是最大化人们的福祉或 GDP，也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人们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 1929 - ）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接着，桑德尔教授对三种正义观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考虑到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过于抽象，桑德尔教授引入了现实中的一个救生船的故事作为例证。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险，船上的四名船员由于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着救援的到来。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救援一直没有来。其中的一名船员，他是一名孤儿，在船上做侍者，因为喝了海水已经病倒了。为了能够维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员最后把这位生病的侍者杀死并吃掉，最后成功地获救，回到了英国。因为杀害了那位男侍者，他们回国后被逮捕，面临法庭的宣判。讲完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给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给这三个人判刑，他们是否有罪？现场听众踊跃地举手发表观点，围绕着集体的快乐是否高于个人的快乐，以及是否能把人作为工具来利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功利主义的观点，桑德尔教授又讲述了另外一个关于“幸福之城”的故事。这是一座超乎想象的美好的城市，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儿孤零零地住在那里，遭受着痛苦。但是没有人来拯救他，因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位孤儿遭受着痛苦。他们不愿意牺牲幸福而去拯救他。针对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换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认为这样可行吗？现场同学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同学们的讨论做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同学们提到的两个观点，即正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义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观点，是对边沁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否定。他还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独白和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为例，讨论了高层次享受和低层次享受哪个更值得追求的问题，认为要对享受做高级或低级的定性判断，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而正义与“哪些享受是值得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关性。

桑德尔教授指出：把道德转换为功利主义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以一个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真实故事诠释了他的这种说法，并结束了他的演讲。桑德尔教授讲述的故事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现场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

评论嘉宾童世骏教授对桑德尔教授的演讲发表了五点评论。首先，桑德尔教



授讲的三类正义观的解释大致对应于哲学上关于“有什么”、“做什么”、“是谁”等问题的回答，分别对应于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论。第二，道德两难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决。从桑德尔的讲演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义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对杀人、酷刑的论据。另外，桑德尔讲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来证明特殊义务，而特殊义务可以证明社群主义道德理论，但承认特殊义务的那种道德分工体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进行辩护。第三，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判断的主体，这使得老师在课堂上运用道德例子与学生进行讨论，有一定局限。他认为，桑德尔让学生选择的火车例子与救生船例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前者，火

车司机的选择是在他之外的5个人死还是1个人死之间，而在后者，船员的选择是在他们自己3个人死还是那个可怜的小孩死之间的选择。第四，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一些理所当然的经验前提，特别是特定时空的条件。有些经验条件是永恒的，比方说人会死亡等等，但有些并不是。桑德尔例子中那艘船的四个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后4个人，我们怎么看？人类这个物种生存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安全成为紧迫问题的条件下，道德考量应该观照这一维度。第五，道德两难可能并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决。关键的问题在于：道德两难的解答可能并不在道德理论当中，而在道德直觉当中——甚至不在道德领域之内，而在于道德领域之外。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体的苦思冥想，而是对这种两难经常发生的那个环境的革命性改造。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社会改造和人格教育来说，功利主义倒有特殊的作用。

评论嘉宾万俊人教授首先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演讲，然后从学理上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他说在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对道德哲学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方式，也就是价值目的论的方式，强调要均衡和计算利弊得失。第二种是康德的道义论方式，强调道德行为的正当理由。这两种方式的终极根源都是自由主义，桑德尔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两种方式。桑德尔教授意图以他的理论作为第三种方式来说明什么是正义，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他建议桑德尔或许可以重新考虑柏拉图的说法，即正义关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其次，万俊人教授对把案例分析运用在正义问题探讨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当案例本身具有极端性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而正义恰恰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形，它关乎我们的生活、社会秩序、利益关系，是每时每地每个时代都遇到的永恒的主题。用这种例外情形的极端推理，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嘉宾的点评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他认为第三种方式不光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评价美好生活的主题。如果没有一个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们便无法理解正义。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个人道德，就太狭隘了。他同意万教授的说法，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这两种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义问题的。用第三种方式论证正义，我们就无法避免去论证人类的好处即，是什么使得人类的生命有意义。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两难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决的说法，但是他认为是否存在正确的做法，或者哪种做法更好或更坏是无法推测的。

现场的听众向桑德尔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正义与合理相冲突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哪种处理方式对社会更有利？”“如果我们是那个船上被杀的男孩，我们该怎么办？”“您认为政府现在的正义状况如何？您在担任小布什总统顾问时对伊拉克行动是否有



建言，您提了什么建议？”等等。桑德尔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

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讲座中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消费。



本次讲坛中，桑德尔将其哈佛校史上听众最多的课堂搬到了复旦大学，吸引了复旦大学各院系师生以及外地、外校的众多听众前来参加。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参与，还特在经济学院大堂进行了现场视频直播。整个会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异常火爆，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旦校史上听众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讲座。大部分听众站着或是坐在地上聆听了整场讲座，并积极思考和回答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问题。整场讲座气氛热烈，听众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舒彩霞)

6. 万俊人教授主讲“美德伦理与社群主义”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七）

2010年3月20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七期由万俊人教授主讲，题目是“美德伦理与社群主义”。万俊人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长期从事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主要的学术论著有：《寻求普世伦理》、《弗罗姆》、《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等等。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陈家琪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吴冠军、刘清平、纳日碧力戈、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参加了此次讲坛。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特别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为大家介绍了万俊人教授的学术研究经历。

接着，万俊人教授开始演讲，他围绕今天的题目“美德伦理与社群主义”主要讲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万教授通过严格的概念界定指出了美德伦理学和社群主义之间关联紧密。首先，他定义其所讨论的美德伦理指的是“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个人在与其独特的社会身份和‘人伦位格’直接相关的道德行为领域或方面所达成的道德卓越或者优异的道德成就。”其次，他将美德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进行对照，指出界定前者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基于个体人格的美德价值及其独特的社会实现的目的论伦理学说。相应地，社群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社群或共同体中心的社会政治理论和社会伦理理论，在学理上与美德伦理学自然而然地结成了联盟。



第二，万教授从思想志向、学理方法、学术语境、解释机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美德伦理和社群主义之间种种复杂的关联形式。首先，两者均是以批判和反省的态度面对现代性，共同针对的是已经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当作现代性之必然理解的自由主义及其衍生形式的普遍理性规范伦理学观念。其次，美德伦理学以道德文化的方式为社群主义的政治主张提供一种具有内在目的论特性的价值精神论证，而后者特（别是作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群主义）为前者提供了一种宏观且具有纵深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基础语境。再次，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大部分美德伦理学家都采取了社群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路线，大部分社群主义思想家都援用美德伦理学的理论资源。此外，当我们进入社会、党派、公民、政治领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范畴的研究中时，许多较为充分有效和合理正当的社会政治解释也都会求助于美德伦理学和社群主义的理论资源。

第三，万教授探讨了作为联盟的美德伦理学和社群主义其中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美德伦理-社群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公共转型及其文化道德后果意识并不充分，它们很难寻找到普世伦理，同时对现代民主政治亦无法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且有混淆现代性批判与现代社会改造间界限的嫌疑。上述这些很难解决的内部问题继而又产生了许多复杂的外部问题，例如：非理论化的指控，道德精英主义和非民主化的指控，个体性和地方性局限，非理性化的危险等等。

最后，万教授指出“如何面对并以恰当有效的方式处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道德问题”，这始终是一个美德伦理学和社群主义的高难度课题，他本人主张在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带有折衷蕴义的“第三条道路”。

评论嘉宾陈家琪教授的点评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陈教授讲了他与万俊人教授在理论主张上的三点相同之处：首先他同意万教授将研究关注点从个人转向社群，不过他也进一步追问，在现时代，道德已不再是一个个人问题，那么美德伦理学和社群主义理论的着眼点是个人，抑或是社群，特别是社群中最先的政治秩序，这里还有许多需要进行理论探讨的问题。其次，陈教授也同意演讲嘉宾关于道德和政治关系的判断

——道德高于政治，政治要效忠于道德，这两者的互补的。再次，就研究方法上，两位学者都同意采用以叙述代替论述和论证的呈现方式，不过基于“事物是作为整体呈现的”这一判断，他更喜欢用依托过程描述问题这一现象学的研究方式。

其二，陈教授讨论了美德伦理学的前提、预设和基础。他指出：如果美德指的是人们去做自己认为是善的事情，那么这里就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每个人得有判断、有知识，这回到了西方哲学美德即知识的传统，另一个是得有宗教的保证，这又涉及到文明根基的问题。多数美德伦理学在事实上区分了有德之人和无德之人，正如孔子区分了君子和小人，柏拉图区分了不同材质的人，那么对无德之人之所以是无德之人，必须要在理论上给出一个说明，即或者归结为家庭出身，或者说是材质的差别，或者说是立场的不同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美德伦理学作为稳定的伦理学，它势必需要一个稳定的有序运行的社群作保证，如果失去了这个条件，那么单纯讲个人的伦理道德将很难说是此举动是现实的。对于人们时常在进行的道德判断，应当要追问我们进行判断



究竟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事论人，如果就事论人，就事情谈论德性，依靠一次两次行动来判断某个人有没有德性，那么这就使得德性本身不再具有稳定性，也进而失去了它的原义。

其三，陈教授引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有关美德和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论述，指出这其中有两个关系，一方面正义高于善，另一方面政治应效忠于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

其四，陈教授指出道德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界限。德性可能日益成为一种对自己规训的技术，但如果将道德视为绝对，那么在道德的名义下将会出现许多危险的事情，例如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正不道德的行为和念头变成消灭自己或大家所认为的不道德的人，这事实上就是德性的不恰当僭越。

其五，针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外的诉求，陈教授认为这第三条道路是寻找不到的。因此，我们恰好也就处于绝望的焦虑的状态当中，也正是因为处于这一糟糕透顶的状态之中，反而更加激发了我们继续寻求和探索的斗志。因此，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是否可以把公民社会的某些程序规范作为最基本的追求，而不是把美德作为最基本的追求。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他指出：

其一，美德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是相互补充的，前者始终进行的乃对人们行为方式的某种高尚的道德提倡，但提倡并不是命令，并不是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提出刚性的绝对的要求。顾教授举了台湾政治生活的例子，说明个人的道德素质对政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公德和私德有区分，施政、行政本身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政治生活当中这是更加重要的。美德伦理告诉我们：即使在民主制度极其完善的社会中，一个政治人物的德性对社会良性运行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顾教授对德福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关于道德的论述是发人深省的，但道德展现出来的具体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道德要求。关于行善是否要有精神和物质回报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道德境界上来说某个人做了好事，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失，不去寻求补偿乃是恪守纯粹的个人道德要求，而需要取得精神或物质的回报则是功利的考虑，这是可以通过社会补偿来维护整体平衡的。

其三，关于正当和善孰先孰后的问题，顾教授指出各民族主导的善显然是不同的，那么如何才能协调统一起来尽量减少发生冲突矛盾呢？一方面要坚持作为底线的美德，即给人们的行为划出禁区；另一方面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自生活方式和欣赏趣味上的差异，而一旦大家陷入对善的标准争论不休的境地时，则必须要遵循正当优先于善这一基本判断。

其四，关于第三条道路，顾教授提出自己抱有“谨慎的乐观”的态度。因为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以人们设定好的标准前行的，人们的预计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的看法，而我们无法逃避并始终相信的是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哪怕没有出路，我们也必须找出新的办法，无数过往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主讲嘉宾万俊人教授感谢两位点评人的精彩评论,并做了简单回应。他指出:自己完全同意两位评论人提出的美德伦理只是柔性要求,不是刚性要求这个判断。至于所谓礼教杀人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看清其背后隐藏的是实质性的人际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到礼教所借助的语言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在场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有:(1)为什么谈论美德伦理的时候不谈论宗教?(2)美德为什么不能转换为制度?(3)叙述和论证的关系如何?(4):您的《寻求普世伦理》这本书为什么不用“追求”普世伦理这个说法?(5)美德伦理的存在和私人生活世界的重建两者是什么关系?(6)内在道德如何传播和运行?(7)



美德伦理学和自由主义关联如何?(8)如何理解产权是道德的守护神这个说法?等等。

万俊人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解答。他指出:(1)宗教、道德、法律最后都需要某种的信仰(信念体系)的支持,这与社会秩序是保障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两块基石。由于不存在证实和证伪的可能,所以对于宗教的存在依据是很难下经验判断的。(2)美德的标准常常是灵活的,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制度背后的东西,其所进行的对制度化了的人和人性化了的制度实施的考量。(3)就道德史来说,人塑造历史,而所谓“塑造”指的是事实上人们对作为传统的历史的超越抑或是否定,这本身又恰恰证明了历史对人的影响。(4)公共人物享受了更多公共资源,按照权责相当、付出等于回报的公平原则,应当履行更多的义务。公共化带给人们利益的同时也不知不觉从人们这里拿去了很多东西。(5)儒家的言传身教是内在道德的传播途径之一,另外社会也可以为道德树立权威性。

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大家能在周末来高研院听演讲,希望本期讲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能够启发大家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联系当下的社会状况并触及到言说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的问题,而不只是简单地纠缠于一些概念。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7.张维迎教授主讲“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五)

2010年3月22日下午3: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202报告厅举行了第二十五场主题讲座。



复旦大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和副院长韦森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另外,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吴冠军、孙国东、沈映涵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了张维迎教授来复旦高研院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简要介绍了张维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和韦森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张维迎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的聘书。接着，张维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的讲演。

首先，张维迎教授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道路就是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经济的高速成长。如果没有抓住全球化的浪潮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然后，张维迎教授归纳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次重要转变：一是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向为沿海、西部和内地更为平衡的增长；三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转变为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的成长。接着，他通过经济规模、人口和交通建设等指标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开发中国国内市场的障碍，主要包括所有制不合理，产权保护太弱、城乡二元分立的现状、经济中的政府主导地位、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不健康的中国企业文化等等。由此，他认为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必须要有配套的制度变革。变革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市场化民营化，二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后，张维迎教授提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责任。未来的路还很长，为此，我们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懂得宽容，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



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张维迎教授的报告宏大而且有战略性，视野很开阔。他对其乐观态度和设想非常赞成。同时，他也针对报告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用进出口占 GDP 的比重这样一个指标来推测中国的未来是不够严谨的。因为该指标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国家规模、劳动力结构、跨国公司的活动等都会对出口产生影响。其次，在中国东、中、西部发展的问题上，与张维迎教授强调中部和东部发展的观点不同，袁志刚教授认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更为重要。再次，针对报告中关于“过去几百年间人口规模与 GDP 的相关性”的图表，袁教授指出，影响 GDP 的不仅仅是人口规模，还有人口结构等因素。最后，他指出，张维迎教授的演讲中十分强调中西部的的发展，强调中国发展的重心要走向内部；他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讲，未来发展还是要高举开放的大旗的。

评论嘉宾韦森教授也发表了他的精彩见地。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现在中国的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市场，这在目前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这种模式在未来发展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同时，针对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未来经济增长应该开发国内市场，而不是扩大内需”的观点，韦森教授做出了一点补充：中国未来经



济的增长不仅仅是物质部门的增长，也要注意“迂回生产”。只有依靠“迂回生产”才能有市场的深化和未来的持续发展。对于如何实现市场的深化与扩展，他认为法制是必要的保障，没有法制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未来的。最后，韦森教授对张维迎教授提到的民主、法制、市场的关系做了更为深入的阐发，他指出，民主保证了法制，法制保证了市场的长久发展。为此，税收法定”、“预算民主”必须要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



针对两位评论嘉宾的意见，张维迎教授做出了回应。他赞同袁志刚教授关于“出口占 GDP 的比重”指标的观点，确实有很多的因素和环节会影响到出口。在东、中、西部发展的问题上，他表明自己并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实力，只是期望未来它们的差距能够变小。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

应该根据现状对已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张维迎教授表示，他非常赞成韦森教授关于民主、法制和市场关系的分析。但是，民主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着急。历史是在前进的，我们要保持乐观态度。



在问答环节，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化的飞快进展所造成的庞大的城镇人口比数会带来什么问题？规范政府的行为单靠法制就可以吗？关于让农民持国有股的设想是从公平角度还是效率角度提出的？当前中国最缺的是效率还是公平？这样一个设想当如何来实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的方式还是自下而上通过市场的方式？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分析是不是过于乐观？经济体改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分开来的，还是并行的？

对于观众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真地做出了回应。他指出，过快的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包括教育、社会福利、农民身份的解决等，这些我们都要面对，不能逃避。关于规范政府行为的措施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对于法制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法制不是说有了法律就有了法制，首先法律要被多数人认可，同时法律的普及也很重要。让农民持国有股的设想如果真要实施的话，应该是给农民一个选择，不是强制。另外，公平和效率不是对立的。市场机制的运作并不使二者对立。对于自己的态度是不是过于乐观的疑问，张教授说，对于任何经济问题的讨论总是存在着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对立，这次演讲讨论的问题中也许自己就属于乐观派。经济体改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并行的，但是不同的时期可能重点不同。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这次讲座做了深刻而又不失诙谐的点评。他引用了哈耶克的话，“经济学家什么都可以干，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干，那就是不能预测未来。”他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绝不只是由数据构成的，还有着很多非意图的结果。不能仅仅根据过去的数据对未来用唯理主义的方式来预测和安排。但凡预测未来时，都要保持一点“理性有限主义”。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

8.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三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

2010年3月24日中午11:5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室高研院“思想者学苑”举行第十三期跨学科双周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主任助理、上海论坛办公室副主任张家栋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沈文辉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本次学术午餐会由邓正来教授主持,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沈丁立教授以及张家栋和沈文辉博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并为两位嘉宾简要介绍了高研院概况和各位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 接着, 向大家介绍了沈教授的基本研究经历和学术成果。

主讲嘉宾沈丁立教授感谢了高研院的这次邀请, 表示非常高兴来到高研院和大家做交流, 并围绕“中国成长: 国际环境与大国心态”这一主题开始发言:

首先, 针对国际环境问题, 沈教授指出当今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 各个国家的主张及行动均显得更加务实, 各自的意识形态纷争意味并没有以前那么强烈, 和平和发展成了世界的主题。特别的, “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 美国和日本在战后先发的领先优势在逐渐失去, 而中国和印度等后发国家人多入穷的传统劣势正一跃成为吸引外包的优势, 成为工业化先进国家争相投资的热土。近年来的宏观统计指标反映, 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与综合实力排位中, 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新调整。”

其次, 针对中国自身的发展, 一方面我们在思想上日益离开曾经沉迷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继续学习其他国家善于利用宽松国际环境的做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对内为国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和充足盈实的物质生活, 对外以大度和诚意对待其他估计, 而不是囿于末节, 因小丢大,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做应有的贡献。



最后, 沈教授结合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等问题指出中国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实质性的工作要推进, 比如说国民心态的改变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探究, 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 内需的扩大和外部依赖的减轻等等。面向未来, 沈教授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充满乐观, 他认为当务之急乃是在不断积聚实力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国内合理公平的制度模式建设。

嘉宾张家栋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人越来越重视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 这反映在大国心态当中就是包容和自信, 因为包容我们能更好地看到他国的长处, 因为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冲突更加重视, 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海必须要正视评价体系 and 现实情况之间的张力。



嘉宾沈文辉指出一个国家的心态主要体现在国民心态上面，是人们评价和解释生活的根本，这其中还有多个层面，作为研究来说，要认真区分各个阶层基于不同利益需求而呈现出来的心态，不能简单化处理。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国民心态对国家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才更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



与会学者就本土化、宣传教育、政治体制改革、族群特征等角度谈了自己的感想，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主要包括：制度是否能囊括一切发展因素？普世价值观的寻求如何才能更好地落到实际？如何区分民主作为理念、制度和现实的操作等不同的指称含义？等等。



沈教授一一详细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着重强调大国心态当中更关键的是从尊重自己的国民出来，不隐晦不滥言，并将这种积极的做法推广开来，进而实事求是地尊重国际环境和世界国民，最终为国家的道德和经济利益寻求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感谢沈丁立教授和张家栋、沈文辉两位教授来到高研院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座谈，并对前述诸位学者的讨论做了扼要总结。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其他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9.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六）

2010年3月27日下午2:30，“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六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研讨的主题为“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舒建军，经济学、教育学编辑杨建芳，历史学编辑耿晓明，政治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报》前沿版编辑张潇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张乐天教授、刘欣教授、周怡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陈周旺博士，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陈润华博士、刘清平教授、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沈映涵博士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目的,然后请复旦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代表学校为本期席明纳作一个简短的致辞,表达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来宾的热情欢迎。

接着,各位到场的学者围绕着“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社会理论的转向”



张乐天教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理论处于转向的原因在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很难用现在所认同的理论来解读世界发生的这些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社会研究领域也需要有三个变化:

第一在重视定量研究的同时,应该更重视定性研究;第二,要对微观层次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第三,更加关注中国的经验。



郭定平教授提出: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它们成了两个体系,使得国内学者无所适从。他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应该打通。



周怡教授则强调:借鉴西方的解析方式去做社会科学研究或许能够引领中国的社会科学到国际舞台进行对话,这将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转变。目前这个转变已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悄然进行。

陈周旺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侧重社会现象;研究价值变化,从过去的国家为中心转到社会的自主性或动力的研究;问题意识方面的变化。



孙国东博士首先对此论题提出了疑问。他说:如果我们在西学语境上理解“社会理论”,即把“社会理论”理解为对社会之构成和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原理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我们根本就没有社会理论。惟一比较接近的是那套已经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强调:我们的社会科学目前还处在他所谓的“问题辨识和问题解释”的阶段,不仅远未达到进行理论建构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还无力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任远教授赞同孙国东博士的说法,认为现在还没有提出社会理论。他说研究范式需要多样化来推动理论的发展。越是研究中国,就越应该有国际的眼光。在国际的背景下,对中国和世界的各种理论要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展开讨论。在追求知识和真理时,各学科就应该相互竞争、“抢饭碗”。

沈映涵博士赞同孙国东博士的观点,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社会理论。中国学者目前所做的更多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所采用的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如此难以提炼出





中国自己的理论。

吴冠军博士则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有没有社会理论的问题。他说社会理论包括三个层面的理论：描述性层面（descriptive），解释性层面（explanatory），规范性层面（normative）。他认为除了解释性层面的理论不足之外，另外两个层面的理论是存在的。



刘清平教授则认为，现在社会研究方面的理论是有的，缺少的是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反思理论本身，而非研究现象，是更有意义的。

林曦博士认为，大家今天都是抱着一种焦虑的心态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对今天讨论理论话语的正当性以及渴求理论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并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来说明了观点。



如何开展中国研究？



刘欣教授以提问的方式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第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是否应该有边界，这些学科应该如何整合起来？第二，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中国的经验，我们究竟应该用中国的理论、还是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用什么方法来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



张江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即理解中国与学术知



识的进步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理解中国和倡导新的学科知识这两者结合起来？面对社会的新变化，他认为提出新的理论比没有理论要好。

陈润华博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归根结底是人事。人反思自身，认识自身，回到哲学最初的发端，就是社会科学永恒面临的问题。

孙国东博士就如何开展中国深度研究谈了三点看法：第一，应当戒绝他所谓的“立场先行”的倾向，而之以对学理分析的重视；第二，要注重社会—历史维度的分析，特别是历史维度的分析；第三，关于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他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学会建构一些“中层概念”。



罗岗教授主要回应了孙国东博士的观点，他补充道：第一，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以及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应是对当时中国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值得我们重视；第二，我们要建构新的“中层概念”的理由还有：我们曾经有解释力的中层概念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已经丧失了解释力。



沈国麟博士则对我们是否急于概念化和理论化提出疑问。他认为，社会科学中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些东西如何概念化或理论化的问题。一旦得到了概念化或理论化，必定是有所得、有所失。放缓这种概念化或理论化，而是先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或许更为可行。

学术总结

邓正来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要真正厘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才能够搞清楚理论的转向问题。因为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社会理论已无法解释现在的社会现象。所有的社会理论从来不关注气候等外部世界的问题，也无法解释与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相关的问题，比如由



此带来的因果律的变化，即从结果相对明确性转化为行为后果的开放性。



最后，舒建军编辑也代表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从学科的角度来讲，社会理论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今天大家围绕着主题进行了非常宽泛的讨论，在场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上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给予他很大的启发。同时，他希望年轻的学者踊跃地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投稿。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舒彩霞)

四.学术来访

1.名古屋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来访复旦高研院

2010年3月1日，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协力部研究支援科、高等研究院行政主管金森荣二和名古屋大学高等研究院基干教员准教授蔡大鹏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

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高研院学术联络中心副主任沈映涵博士等学者参加了座谈。复旦高研院科研与外事秘书舒彩霞参会并做记录。



邓正来教授代表大家欢迎两位学者来到复旦高研院，接着两位日本专家介绍了三所名古屋大学高研院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高研院设置的经过和活动理念，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位置以及大学总部对其的支援，运营体制等等。他们指出名古屋大学高研院的学术和教学工作主要针对研究生培养，开展的学术活动采取讲座、论坛和席明纳等多种形式，聚集世界一流的学术名家，力图培养出优秀的跨学科的学术人才！

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从创院背景、学术理念、学术团队、工作模式、远景规划等几个方面向客人们扼要介绍了高研院的基本情况，强调“高研院”将继续秉承“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的学术理念和“追求学术卓越”的学术传统，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等国外相关机构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依循“扎根复旦，辐射上海，影响中国，走向世界”建院之道，力争为强化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品格、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水平做出贡献！



座谈会上，双方就高研院研究模式、运营成本、发展方向等问题做了交流，并就未来两院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初步协商。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对两位客人的来访表示了感谢，并向他们赠送了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等礼物。

2. 法国高等社科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普吉兰教授来访高研院

2010年3月6日上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EHESS)普吉兰(Guilhem Fabre)教授来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欢迎普吉兰教授的到來，两位学者就高研院与研究中心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回顾了近年来各自的学术研究兴趣与重点，主要涉及“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优先性和可欲性是怎样的”、“西方社会科学不加追究的一些先验性或前提性的假设是什么”、“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进程”、“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两位教授还特别针对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许多



问题做了深刻细致的学术讨论，包括“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缺少自主性”、“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所做的各种正当性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表面上所忽略而实际上深受其影响的某些前提和规制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知识引进过程中的不意识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全球化的视野对当今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全球化范式如何建立”等问题。

此外，普吉兰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还对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与高研院的学术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3. 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2010年3月22日上午，中国文化大学（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传媒系教师、美国德州大学博士何慧仪和上海业务主管黄琬伦来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代表高研院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欢迎来访客人,并介绍了高研院的学术宗旨、学术定位和发展概况。来访嘉宾介绍了中国文化大学的历史和发展概况,特别是“推广教育部”可以与高研院进行学术合作的领域和方向。双方就互派访问学者、个体开展其他形式的学术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初步的商谈,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行来复旦高研院调研

2010年3月2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舒建军,经济学、教育学编辑杨建芳,历史学编辑耿晓明,政治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报》前沿版编辑张潇爽一行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进行调研,与高研院全体研究人员进行座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沈映涵、邓正来,学术联络中心陈晔、舒彩霞、王晨丽参加了本次座谈。

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诸位来宾,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高研院的发展状况:

首先,邓教授介绍了高研院的成立背景、学术定位、学术理念、建院之道、研究路径。他强调:高研院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坚持“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路径,遵循“扎根复旦、辐射上海、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建院之道,努力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其次,邓教授介绍了高研院团队建设的思路 and 目前主要成员。他强调:高研院不仅设有专职研究人员,同时采用以名誉教授、特聘讲座教授、学术委员、特聘研究员、双聘教授、兼职教授和“学术工作坊”(work-shop)等建制“借用外脑”的团队建设模式。

再次,邓教授介绍了高研院去年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出版物和学术成果。他说:高研院的两个常规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性的论坛。我们去年办了60余场讲座,但平均每场的花费仅2650元(因为我们不设讲课费)。到此讲坛的主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主讲人学术水平的认定,它本身已成为一种荣誉和资格。

最后,邓教授还简要提到了2010年的学术工作要点,主要包括:团队和机构建设、协商民主国际会议及Workshop、长三角人类学论坛、正当性与治理学术会议、亚洲人类学会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年会等等。



来访嘉宾针对邓教授的介绍提出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Fudan Journal的来源及发展方向是怎样的?高研院研究是否有一个长期的机制

或者隐含的主线？如何更好地开展跨学科交流？高研院的资金来源以及如何保持人员不流失？高研院的目标是建立类似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科研机构么？是否希望这样的高研院越来越多？等等。



邓教授和高研院其他研究人员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们强调：高研院是一个“大家庭”，在学术讨论中着重打破师生、长幼、行政三种秩序。高研院是一帮对学术有深刻体认并将献身学术作为“志业”（而非“工作”）

的人组成的一个“基于情感共同体的思想共同体”。我们的理念是“体制中的体制外”，即借助体制中的平台和资源做“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研究。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舒建军围绕学术研究的持续性这个主题做了发言。他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创新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高等研究机构的成立和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的整合研究。前者在机构、组织、管理上对学术创新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当然在内容上也有明显不同于系所的研究特色；后者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从量向质转化的趋势，在众多经验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复旦高研院在营造学术团体专注研究这一良好氛围的同时，还可以在中国问题研究这个层面上找到一两条持续研究的道路，发掘出对社会问题本身活生生的理解，而非落入“辞章之学”的窠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历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后形成高研院发展的品牌和特色。

中午，高研院宴请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行，并于当天下午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主办了主题为“社会理论的转向于中国社会的建设”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五.学术出访

1.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 2010 年太湖文化论坛筹备工作会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 2010 年 1 月 25-26 日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的太湖文化论坛“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促进世界和谐与发展”筹备工作会议并发言和提交书面建议。



太湖文化论坛是参照达沃斯论坛的模式和经验创立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旨在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太湖文化论坛的永久坛址设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太湖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会议设在中国北京。

2.邓正来教授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主讲“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

2010 年 3 月 17 日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应邀做客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为华东政

法大学师生带去了一场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法学研究”的讲演。著名法学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月刊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童之伟教授主持了讲座。



在历时近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中，邓正来教授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发展经验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法学的使命、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于全球化，邓教授首先指出了中国法学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两个背景：其一是社会结构性背景，其二是思想背景。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

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世界游戏的规则。但是，有发言资格未必就等于有发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这种资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形式而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就后者而言，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不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特定时空中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因为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也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就中国30年的改革而言，邓教授强调我们不可忽视（相对学者的理论性智慧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性智慧所具有的作用。中国并没有遵循前苏联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解释。



接着，邓教授分析了中国法学所存在的三大困境。一是“西方化困境”，即以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判准。二是“唯学科化困境”，即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导向”根本没有看到当下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所有的问题都处于变动中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共时性”（他以“生存权”与“环境权”为例，说明西方“生存权”与“环境权”诉求是按自然时间展开的，而在中国却是共时性出现的）。三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全球化时代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而使得非预期后果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分别从如何形成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律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如何评价早期关于国际私法的研究等问题与邓教授展开了讨论。

本场讲座在可以容纳近500人的长宁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整场讲座，座无虚席，邓教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听众们的如潮好评。

3. 邓正来教授参加上海社科院第四十四次新智库论坛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开题报告会

2010年3月19日上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上海社科院第四十四次新智库论坛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主题为“中国模式”的论坛上,邓正来教授做了大会发言。他从“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这一概念入手,对中国社会科学界在探讨“中国模式”的“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同时也对“生存性智慧”的含义及其

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邓正来教授还参加了以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开题报告会的讨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等参加了本次“中国模式”论坛及报告会。

4. 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参加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参加于2010年3月27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的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并做特邀致辞,题目为“林先生印象”。



纪念会由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林先生的家人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代表参加会议并致辞。

5. 林曦博士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美国卡特中心

联合举办的研讨会

2010年3月12日和13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应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讨论。

六. 稿约及启事

1. “生存性智慧”: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

2010年长三角人类学会议

“生存性智慧”: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

一、主旨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时,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也提出了挑战。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道,正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全球资源的可持续性已经真实地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面前,人类社会又面临新的抉择——是继续无限制地挥霍资源,超出我们生存环境的承载能力,还是开始寻求和建设绿色文明,开辟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路?

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不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是认知、思维和伦理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邓正来先生对人类社会\自然研究做出独特而具有原创性的智性努力,围绕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和各种问题,如何反思或批判既有的中西各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以及这些知识研究遮蔽了什么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邓先生指出,所有“知识导向”之研究已陷入困境,新世界观的研究立足于横跨传统、当下、未来的超时段“生存性智慧”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批判和否弃“社会研究”,解释西方社会理论无法解释和理解的现象(包括西方现象)。同时,这也是中国学者对整个世界学术的可能性贡献,是对中国人当下生命中所隐含的传统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的、去西方化的独特审视。

“生存性智慧”概念,与知识分子最近的一些思考紧密相关,但接近于它的观念,也广泛地存在于世界诸文化中。过去,研究这些文化的人类学家,因拘泥于进化主义、社会学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故未深入研究诸文化中接近于“生存性智慧”概念的“智慧”。以中国为例,在广大的民间,有社会科学家未集中研究的有知识和智慧:农民知道何时何地要休耕和轮耕,“让大地母亲休息”;猎民不杀怀孕的母畜,不乱砍乱伐,“表达对神山圣灵的敬畏”,当然也因此保证了可行性发展。中国西南的一些民族和睦相处,发展出“牛马亲家”,一方出牛、马、羊,另一方饲养,生下的幼畜双方共有,利益均分,或者双方共同合伙出牛马,轮流饲养使用。“牛马亲家”友好相处,营造了和谐的生存环境,很好地适应了当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美美与共”、互利双赢的多样化新生态观应当指导全球化背景下的旧发展观;新时代中的各种智慧必将形成人类及至宇宙的大智慧,来回应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超级挑战。这可能是关于“世界时刻”的最佳“中国表述”之一。

“原始社会”的“生态-社会时间”,古代欧洲关于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哲学辨析,老庄“绝圣弃智”的“思考”,及新近的同类思考,都值得我们重视。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从“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出发,基于推动绿色文明创新发展的学术视角,共同主办的以长三角人类学家为主体的“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学术讨论会。

二、具体议题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探索,邓正来先生近期总结出以下七点看法(引自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的研究论纲, 2006年7月初稿/2010年1月定稿,未刊):

1.就现在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基本都是“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而非“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从根本上认为:

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自然的生存性本能及其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揭示和解释。

2.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非逻辑斯意义上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或去意识形态的以生存\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3.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无论是知识增量的,还是批判和反思的,全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中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4.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甚或是意识形态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上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5.“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它是去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却是以知识和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

6.“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是活生的,有效的,灵活的,或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因地位不同而不同,因性格不同而不同,因此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的。它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7.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本次会议将围绕邓先生所提观点展开讨论,与会者可针对以下任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1.如何看待“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研究与“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研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既有接近于“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观点的传统、知识与哲学面貌如何?

3.如何融合经验性、理论性和哲学性研究,以求对于“生存性智慧”的深度理解与揭示?

4.如何看待“默会知识”与多元共生之间的关系?

5.“生存性智慧”的普遍价值如何？

三、会议安排

1.时间：2010年6月4日报到，5日—6日开会。

2.会议地点：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内）

3.参会对象：会议以长三角地区的人类学者为主，另邀请相关人类学者参加。同时，欢迎对该主题感兴趣的学者或研究生通过征文方式参加。

4.其他：会议不收会务费，来往交通费、食宿费用主办单位承担。

四、征文方式

有意参加会议者，请围绕拟定会议主题撰写一篇论文（不少于5000字，并附中英文摘要，注释规范依据请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于2010年5月10日前将论文电子版发送给会议筹备组，邮件主题为“生存性智慧征文”，经会议专家组评审确认后，即发给会议正式邀请函。

主办单位将编辑出版文集，并选取部分会议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

五、筹备组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联系人：沈老师 陈老师

电话：021-55665553，021-55665552；传真：021-55665552

E-mail: ias_fudan@yahoo.cn

会议学术召集人：邓正来、王铭铭、纳日碧力戈

2.复旦高研院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招生启事

为了提高中国青年学者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力，拓展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强化中国化的问题意识，推动青年学者从事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研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于2009年7月举办了第一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高研院拟将该讲习班作为品牌活动予以建设，并努力将其打造成一个高水准、高层次、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的高级培训基地。

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将2010年7月举办的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的主题确定为：“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现发布招生启事。

一、课程目标

培训并团结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并引领他们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发展动态、理论、学派、范式和方法，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研究，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阐释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进而培养一批致力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学术创新、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关怀的杰出学术人才。

二、授课导师

讲习班将聘请6名国内或华裔著名社会科学学者作为授课导师：

Bin Wang(王国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主任，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顾肃——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童世骏——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将邀请国际知名学者 **Daniel A. Bell (贝淡宁)**、**Edward Friedman**、**Joseph Fewsmith (傅士卓)**、**Jack Donnelly**、**Peter Moody (穆磐石)**、**Philippe C. Schmitter**、**Chu Yan-Han (朱云汉)** 围绕“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举办系列讲座。

三、授课时间、地点与方式

1. 2010年7月5日(周一)—7月16日(周五)(7月3日-4日高研院将主办“正当性与治理理论”国际学术论坛；欢迎学员提前旁听或参与讨论)；

2. 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3. 授课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高研院“通业大讲堂”(2801室)；

4. 讲习班上午由主讲老师集中就某一论题做系统讲解，下午将由全体学员同主讲老师一起展开主题性研讨；

5. 外籍学者上午用英文讲座(不提供同声传译)，但当天下午讨论时，高研院将提供同声传译。

四、结业方式

讲习班将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名义授予结业证书。

五、费用事宜

1. 讲习班不收取报名费和任何其他费用；

2. 高研院将免费提供课程材料，并为学员一次性提供讨论用书补贴300元；

3. 高研院将为学员举行欢迎宴会，并组织全体学员郊游；

4. 学员的差旅费和食宿费自理，高研院可为学员代为办理入住复旦大学招待所的住宿手续(复旦招待所住宿标准：四人间，50-80元，如需要高研院代办，请明确告知)。

六、报名与录取

“高级讲习班”面向全国(包括台港澳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招生：

1. 基于学术规范和学术平等的原则，我们将组织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按照**纯粹的学术标准**择优录取30位学员(若报名者依据严格的学术标准不足30人，我们将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2. 报名者须提交代表性学术论文1篇和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读书报告1篇(长短不论、发表与未发表不计、中英文均可)，但是报名者不得透露任何有关

该论文和读书报告所发刊物的出处信息,也无需提供任何有关自己学术成果数量和获奖的信息;

3. 报名者须提供所学专业的信息,但不能够透露所在学校和导师的信息;
4. 为了听懂外籍教师的讲授,学员必须具有较强的英语听力能力;
5. 请把相关材料用电子版直接发送高研院,不接受纸面来稿。
6. 具体录取名单将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以后在高研院主页

(<http://www.ias.fudan.edu.cn>) 公布,并将以电邮的方式通知录取者,请随时留意网页通知。

七、报名期间与联系方式

- 1、即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20 日
- 2、联系人: 沈老师
- 3、Email: shenyinghan@126.com

附: 部分外籍教授简介

Daniel A. Bell (贝淡宁) is professor of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He was born in Montreal, educated at McGill and Oxford, has taught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nd has held research fellowships at Princeton and Stanford. He is the author of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Shanghai Sanlian Chubanshe), *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e is the editor of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the coeditor of six books. He write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for *Du Shu*, *Dissent*, *Newsweek*, and the *Guardian's Comment Is Free* blog, he has published commen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Huanxiu Shibao*,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nd the *Toronto Globe and Mail*, and he has been interviewed on CCTV, NPR, BBC, and CBC. His articles and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Chinese and twelve other languages.



Edward Friedman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mocratization, Chines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olu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itions in Leninist States. His most recent books are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1991),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1994),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1995), and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Implications for war and peace* (2001).

Jospeh Fewsmith (B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A,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 Direct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 an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University. He specializ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is the author of four books: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2001),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1), *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1994), and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980-1930* (1985). He is very active in the China field, traveling to China frequently and presenting papers at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such a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is articles have appeared in such journals as *Asian Surve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The China Journal*, *The China Quarterly*, *Current Histor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and *Modern China*. He is also a 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ck Donnelly is Andrew Mellon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Denver. He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in 1982. Most of his writings have been in the broad,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of human rights. They include three books --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2003),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ird edition, 2006) -- and over fifty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nine languages. He i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which advance a strong argument for a relatively universalistic approach to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He has also written on the theory of human rights,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group right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is current human rights work focuses on a book-length project comparing conceptions of human dignity, with extended case studies of the West and China from "ancient" to "modern" eras.

Peter Moody (穆磐石)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South Bend, Indiana. Moody specializes in Chinese politics. His more recent books include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7),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1994),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1991)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st-Confucian Society* (1988). He is editor of *China Documents Annual* and book review editor of *The Review of Politics*. He has written on Chinese politics, A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Philippe C. Schmitter is a Visiting Fellow of Center for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He wa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until September 2004. He was then nominated Professorial Fellow at the same Institution. Born in 1936, he was a graduate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and took his doctor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ince 1967 he has been successively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in the Politics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n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1982-86) and at Stanford (1986-96). He has been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ies of Paris-I, Geneva, Mannheim and Zürich, and Fellow of the Humboldt Foundation, Guggenheim Foundation and the Palo Alto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e has published books and articles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on the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in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and on the intermediation of class, sectoral and professional interests. His current work is on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ing Euro-polity,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countries, and on the possibility of post-liberal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Yun-han Chu (朱云汉) 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1987), 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 现任 (台湾) 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民主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曾三次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研究杰出奖, 以及担任 (台北) 中国政治学会理事长、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目前还担任 *Journal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Pacific Affairs*, *China Revie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 以及“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0 年 3 月 9 日

3.Fudan-UCLA 第二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招生启事

根据复旦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达成的校际协议, 双方决定轮流在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办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班 (以下简称“翻译班”), 并分别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孔子学院负责实施。首届翻译班于 2009 年 8 月在复旦大学举办。考虑到中国学生普遍难以承受去美学习的旅行和生活费用, 第二届翻译班仍暂时安排在复旦大学举行。

翻译班将分为英译中和中译英两个翻译小组,分别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负责在中、美招生,并同期错时上课,鼓励学员相互旁听对方课程。

现面向复旦大学和其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招收第二届翻译班英中翻译小组学员 12 名(其中复旦大学 8 名,外校 4 名)。

课程目标

翻译班英译中课程以培养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人才为目标,旨在引导学员避免中文社会科学学术翻译中常见的误译、漏译和中译不确等问题,培养一种认真、平实和严谨的学风,并经由该课程中所展现的逐句翻译与研讨传授给学员“由翻译而研究”这一做学问的门径与方法。

主讲教师

翻译班英译中课程主讲教师为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中译英小组主讲教师为著名汉学家、UCLA 东亚系胡志德教授)。

此外,邓正来教授还将邀请国内其他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为学员举办相关学术讲座若干次。

上课时间与地点

2010 年 8 月 9 日(周一)—2010 年 8 月 27 日(周五)每周二、周三和周五下午 14:00-17:00(同期中译英小组上课时间为每周一和周四下午 14:00-17:00)。

授课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高研院“通业大讲堂”(2801 室)。

课程方案

课程强调阅读与翻译并重,既引导学生掌握英文学术原典的阅读与翻译技巧,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倾向。

由主讲教师指定适合学员阅读和翻译的英文社会科学文本,然后在主讲教师的指导下逐句精读该文本,亦即由学生在上课时逐句轮流翻译,然后由指导教师予以点评与指导。学员在课程结束时须提交自己对该文本的中译定稿。

为了确保学员自己进行认真、独立的思考,同时为了课上的讨论能够集中、有效并能够尊重其他学员的时间,要求每位学员做到:第一,每次课前必须独立地进行书面翻译,切勿与其他学员商量;第二,只有完成了书面翻译的同学才有资格在课堂上发言并参与讨论。

注:课程从第一堂课开始,因此,要求学员在第一次课程开始前务必翻译好一定篇幅的内容(一般两页纸的内容即可)。所使用的英文社会科学文本将于与录取名单一起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页另行通知,请到时自行下载。

结业方式

本课程不设学分,但将综合依据学员在如下方面的表现以“复旦大学”的名义授予结业证书:

- (1) 学员在课堂上所提供的译文;
- (2) 学员在课堂讨论时的表现;以及
- (3) 学员在课程结束时所提交的译文最终版本。

辅助材料

《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Texts) (请到下列网址下载中英文版

本: <http://www.acls.org/programs/Default.aspx?id=642&linkidentifier=id&itemid=642>)

费用事宜

课程不收取报名费, 学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复旦校方将举行欢迎或闭幕宴会, 并将组织中外学员一起郊游。

报名与录取方式

请在2010年6月30日前将包含个人基本信息(请务必注明手机号)和学术成果(若无学术成果, 可以未刊论文或读书笔记代之)的个人简历、身份证扫描和学生证(教师证)扫描件发至: sunguodong0227@yahoo.cn, 请在邮件主题注明“暑期翻译班报名”。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将组织相关专家综合依据学员的学术积累和英语水平择优录取。

具体录取名单将于2010年7月10日以后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页公示, 请随时留意网页通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孙老师

联系电话: 55665556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0年3月8日

4.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稿约

本刊宗旨

作为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专业性学术刊物,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以“根据中国、学术为本”为学术理念, 坚持纯粹的学术原则。它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依托, 但以中国政治哲学同仁以及其他关注政治哲学问题和理论的同道为知识共同体, 努力将其办成主要展现汉语学人政治哲学研究优秀成果、网络汉语世界政治哲学研究中坚力量, 并向世界展现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优秀成果的一个学术平台。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倡导以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建构之正当性为出发点, 以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中西各种政治哲学理论资源, 力争引导中国学人建构起基于中国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并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政治哲学学派。

本刊创办/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主编: 邓正来

学术委员:

汪晖(清华大学)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
何怀宏（北京大学）
万俊人（清华大学）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
陈来（北京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林尚立（复旦大学）
陈明明（复旦大学）
桑玉成（复旦大学）
刘清平（复旦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顾肃（南京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姚大志（吉林大学）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李强（北京大学）
包利民（浙江大学）
应奇（浙江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
张小劲（清华大学）
任剑涛（中山大学）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
白彤东（中国人民大学）
洪涛（复旦大学）
丁耘（复旦大学）
吴冠军（复旦大学）
钱永祥（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萧高彦（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慈继伟（香港大学）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
Daniel Bell（清华大学）
邓正来（复旦大学）

本刊评审规则

本刊致力于中国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建设，其间当包括在办刊编辑中努力确立以学术价值为唯一依归的、合乎国际学术期刊惯例的正规匿名审稿制度。实行此一制度，旨在使学术研究尽可能地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学术论文的评审取舍尽可能地以学术质量为标准而公允地展开，以确保本刊的学术品位和质量，实现本刊“根据中国、学术为本”的宗旨。本刊真诚地欢迎广大作者、读者与

我们编者一起共同从事此一学术制度和规范的建设,进而使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以其学术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展现于世界学坛。

- 1、本评审规则适用于投赐本刊的所有文稿。
- 2、本刊主编负责初审投赐的全部文稿。经主编初审认可的文稿方可进入评审程序。未获初审认可的文稿自稿件收到之日起三个月内可另投他刊。
- 3、文稿经主编初审认可后即进入正式评审程序。评审工作按双向匿名方式进行;在贯彻回避原则的前提下,每篇论文至少由两位学术编委评审,亦可由主编聘请学术编委会以外的学术专家或知名学者进行评审。
- 4、负责评审稿件的编委或学者严格根据论文的学术质量提出书面评审报告,并依据①可考虑采用;②须经修改,再作评审;③不适宜采用的分类提出意见。评审报告的内容于六个月内通知作者。
- 5、稿件最终采用与否由主编根据评审报告、本刊学术论题总体安排情况以及本刊宗旨作最后决定。

本刊投稿方式

凡欲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投稿的学人,须提交电子版本。电子本请存为 Word 文本。请专投本刊。

电子版本请寄交下述地址(请注明专投《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dzlai2009@gmail.com, 邓正来收。

其它声明

- 1、本刊为半年刊,每年3月、9月出版,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
- 2、本刊投稿文章必须为未发表的首发稿,请勿一稿多投。
- 3、本刊发表文章并不代表本刊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 4、论文中牵涉版权部分(如较长之引文),须获得原作者或出版社的授权,本刊不负版权责任。
- 5、本刊发表文字,未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书面允许,不得转载。
- 6、本刊有权对来稿文字按稿例作一定删改,不同意删改者请于投稿时注明。
- 7、文稿发表后,将致薄酬。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稿例

基本要求

以“专论”、“短论”、“译文”等形式投稿,需提供作者简介。要求来稿按如下顺序标明作者信息:姓名、工作单位、职称及学术兼职、所在省市、邮编、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以便寄送样刊和稿费)。

以“学术论文”投稿,作者除了提交学术信息外,还需根据具体情形提供如下信息:

- 1、摘要:要求以“摘要:”起头,应为论文主要内容的浓缩和提炼,不应使用诸如“本文认为”“笔者认为”等评价性语言,字数在300汉字以内,无需英文摘要;
- 2、关键词:要求以“关键词:”起头,应为反映论文最主要、最核心内容的专业术语,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隔,一般每篇论文可使用3~8个关键词,无需英文关键词;
- 3、基金项目:如果来稿属于基金项目资助范围内的研究成果,请在首页下脚标明论文产出的资助背景,包括基金项目的类别、名称、批准号;

4、英文信息：来稿请附录论文的英文标题及作者单位名称。

为便于匿名评审，请将上述作者信息单独以一页附在正文前，且不要在正文中透漏任何作者信息。

正文体例

一、文稿请按题目、作者、正文、参考书目之次序撰写。节次或内容编号请按“一”、“二”……之顺序排列。

二、正文每段第一行空两格。独立引文左缩进二格，以不同字体标志，上下各空一行，不必另加引号。

三、请避免使用特殊字体、编辑方式或个人格式。

注释体例

一、文章采用脚注，每页重新编号；编号序号依次为：①，②，③，……。

二、统一基本规格（包括标点符号）

【国籍】主要责任者【两人以上用顿号隔开；以下译者、校订者同】（编或主编）：《文献名称》，译者，校订者，出版社与出版年，第 页。

三、注释例

（一）著作类

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90 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9-90 页。

（二）论文类

邓正来：《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载《哲学研究》2008 年第 10 期。

[德]曼斯菲尔、邓正来等：《与施特劳斯学派相关的若干问题——与 Harvey C.Mamsfield 教授的对话》，载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冬季卷（总第 25 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1 页以下。

（三）报纸类

沈宗灵：《评“法律全球化”理论》，载《人民日报》1999 年 12 月 11 日第 6 版。

（四）文集和选集类

刘小平：《“理想图景”讨论：知识的反思与社会行动》，载刘小平、蔡宏伟主编：《分析与批判：学术传承的方式——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5 页。

[德]康德：《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02-203 页。

（四）古籍、辞书类

《管子·牧民第一》卷一。

[清]沈家本：《沈寄簠先生遗书》甲编，第 43 卷。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83 页。

（五）英文类

1、英文著作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3-15.

2、文集中的论文

Niklas Luhmann, *Quod Omnes Tangit: Remarks on Jürgen Habermas's Legal Theory*, trans. Mike Robert Horenstein, in *Habermas on Law and Democracy: Critical Exchanges*, eds. Michael Rosenfeld and Andrew Arato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57-172.

3、期刊中的论文

Jürgen Habermas,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Remarks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92(3)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Mar., 1995), p.117.

四、其他文种

从该文种注释体例或习惯。

五、其他说明

(一) 引自同一文献者，同样应完整地注释，不得省略为“见前注”或“前引”等。

(二) 非引用原文，注释前加“参见”（英文为“See”）；如同时参见其它著述，则再加“又参见”。

(三) 引用资料非原始出处，注明“转引自”。

七. 媒体报道

1. 学术访谈：从“研译”哈耶克出发

《出版商务周报》2010年1月24日

受访者：邓正来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务学院博导

采访者：张春海

出版商务周报记者

文章节录：

在中国学术界，哈耶克的名字与邓正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邓正来曾经“闭关”专事哈耶克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被认为是最有建树的华人学人之一，《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哈耶克的最重要作品由他译为中文。同时，哈耶克研究并非他个人的学术的终点，在这种与大师的对话中，他也在明确着自己的学术思路，思索着自己的“终身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与哈耶克为友”、并与哈耶克出发走向人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等问题

的学者。

思量哈耶克的“终身问题”

《出版商务周报》：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即内部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及思索对人类文明的捍卫有哪些启示？



邓正来：这是一个意义重大但比较复杂的问题。哈耶克在其所著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对他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得出了这样一个最终结论：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置其于权威当局指导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



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他说，这是他四十年来研究就这些问题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不仅为我们理解他的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基础提供了最明确的启示，而且也的确勾画了哈耶克整个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毋庸置疑，贯穿于上述核心命题的乃是个人自由与整体社会秩序间关系以及秩序与规则间关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and 解释就是“哈耶克的终身问题”，或者说，哈耶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核心目的乃在于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即内部

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因为正是这个“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反映了或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哲学的建构过程。

如果说哈耶克的这个“终身问题”对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有所启发，我想，这种启发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哈耶克对计划模式的批判来看，尽管我们对其某些理据和结论仍可提出质疑，但他从制度、实践到观念形态等方面出发对各种集权体制和唯社会论的反思和批判的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对“自生自发秩序”有更充分的重视。其次，哈耶克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士，他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指向了自由主义观念的核心层面。在哈耶克看来，无论是他所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他所担忧的当时欧洲占主导性地位的观念，都源自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一种异变，这种异变以“自由”的名义，却走向了对“自由”的反动。哈耶克清晰地标示出了它的源流，他称之为一种“大陆的”、“建构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它首先来自笛卡尔（也有英国的霍布斯）提出的唯理主义，在 18 世纪通过法国启蒙哲学而影响大增，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高潮。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有“百科全书”派成员卢梭和重农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敌人——唯社会论或集体主义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在 20 世纪弘扬并捍卫了拿着发端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